

中国青年研究中心
青运史研究文库

共青团史 人物传

GONGQINGTUANSHI
RENWUZHUAN

第一辑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编

李艳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青运史研究文库

共青团史 人物传

GONGQINGTUANSHI
RENWUZHUAN

第一辑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编

李艳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青团史人物传. 第1辑/李艳主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53-3203-1

I. ①共…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员—先进事迹

IV. ①D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1569号

责任编辑: 徐 泳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511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6.7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研究文库

顾 问：郑 洸 李玉琦

编委会主任：王义军

副 主 任：叶学丽 李 静

委 员：王义军 叶学丽 李 静

李 艳 胡献忠

本书主编：李 艳

目 录

高君宇	001
施存统	019
张太雷	032
蔡和森	047
俞秀松	059
张秋人	069
林育南	079
贺 昌	090
邓中夏	104
刘仁静	119
恽代英	134
李求实	151
任弼时	167
刘尔崧	182
陈乔年	199
李子芬	210
杨善南	220
关向应	227
卓恺泽	240
华 岗	252
后 记	264

高君宇



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曾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

一、家庭教育熏陶立志救国救民

高君宇,名尚德,字锡三,君宇是号,曾先后用过天辛、江越、记清修等化名。他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山西静乐县峰岭底村(现属娄烦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高君宇的父亲高佩天,先在乡村教书,后改经营商业,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他经常给儿女们讲义和团的悲壮故事,这使高君宇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因此,他常和本村的小伙伴们,手持木制刀矛,做着“义和团痛打洋鬼子”的游戏。1906年,高佩天和本县的一些绅士,经谷思慎、南桂馨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的革命活动,使少年时期的高君宇耳濡目染,逐渐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对清朝腐败无能的统治深恶痛绝。

1909年,高君宇和哥哥高俊德一起考入静乐县高等学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这次革命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少年时代的高君宇也被革命浪潮所鼓舞,他同父亲一起,响应革命党的号召,毅然剪掉了长辫子,以表示拥护革命的坚定决心。不久,高君宇又说服了母亲,在全村第一个破除了妇女缠小脚的陋习,让妹妹高

志娴免去了缠足之苦。

辛亥革命后,高君宇怀着“立意深造”的热望,于1912年春“负笈抵省”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他勤学好问,成绩优异,尤以国文见长,“所作诗文,多有奇气”,常被老师推荐“贴堂”,同学们争相传抄,视为范文。当时省立一中是山西新思潮的中心,高君宇在这里阅读了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915年后,《晨报》和《新青年》等报刊,更是他每日必读之物。他经常和进步同学们讨论国事,十分关注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

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依旧处在黑暗之中。有一年晋西北大旱,赤地千里。高君宇假期返乡,亲眼看到饥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政府官员根本不理民间疾苦,他“愤懑填胸,嘘唏浩叹”,返校途中,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部分银元和衣物,分赠给穷苦农民。

1915年,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全国革命斗争的影响下,省立一中的学生们自动组织起来,在文瀛湖畔集会,发表演讲。高君宇和同学们每晚聚集在教室里,阅读着从外地传来的《敬告全国父老书》,起草了反对袁世凯的传单和标语。

1915年10月,省立一中的学生们罢课了,高君宇和全校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沿途尽管遭到军警阻挠,但他们毫不畏惧。在太原最繁华的柳巷,高君宇手持《敬告全国父老书》,向群众宣讲起来,他慷慨激昂地告诉人们亡国灭种已迫在眉睫,要团结起来,反对复辟,抵抗侵略。

1916年,高君宇在《各述尔志》的毕业试题中,挥洒笔墨,写下了自己的坚定志向:“当此之时,君宇已蓄革命之决心矣”。^①

二、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学生领袖

1915年9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观点和态度。当时的口号是:反对旧文化(指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这一声振发聩的口号,唤醒了一代青年,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

^① 高君宇墓志铭。

统治地位。自从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后，以北京大学为核心，聚集了李大钊等一批《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因此，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6年夏天，高君宇怀着改造社会，探求真理的远大抱负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高君宇十分赞同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提出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他也极力拥护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校方针。不久，高君宇即加入蔡校长倡导的“北京大学进德会”。

1918年初，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高君宇十分敬仰的人物。同年10月，北大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高君宇和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等成了该会第一批会员。《京报》名记者邵飘萍多次为他们讲授新闻学的理论和采访技巧。这为高君宇后来编辑《向导》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等刊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到中国，对高君宇产生了巨大影响。高君宇从李大钊那里看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了解到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形，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他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等问题。

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旨在控制中国和干涉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警的殴打、拘捕。他们不畏强暴，组织救国团，推举李达等为归国代表，罢课回国，以便联合北京等地学生，共同向段祺瑞政府进行斗争。这一爱国行动立即得到北京爱国学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20日，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到车站欢迎归国代表。第二天，高君宇等组织北大、高师等校2000余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新华门，包围了总统府，怒斥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高君宇在此发表了演讲：“军阀政府无权出卖中国，中国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老百姓的手中。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政府，赶走帝国主义。”这次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使他们深深感到一定要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反动政府继续斗争。

于是，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以及张国焘等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并派黄日葵、许德珩南下串连，扩大学生救国会的影响，后

来学生救国会发展成为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团体。

为了便于进行反帝爱国宣传,10月20日,学生救国会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在《国民》杂志社起骨干作用的是当时北大先进学生的代表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该社确定了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①为宗旨。该社成立之初,遇到资金的困难,高君宇慷慨解囊,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使《国民》杂志于1919年1月顺利出刊。李大钊、高君宇在《国民》杂志连续发表了很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文章,突出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团结广大青年反帝爱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高君宇还加入了宣传新文化的《新潮》社,并为《新青年》、《晨报》、《国民日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积极撰稿。

1919年4月30日,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蛮横地将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并拒绝中国关于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消息传来,全国震惊!高君宇和《国民》杂志社成员于5月1日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行动部署。他还同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学将李大钊当天发表的《五一杂感》中明确提出的“直接行动”的口号,传到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中去,一场大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在法科礼堂举行大会,高君宇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主张游行抗议当局。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游行;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统一行动。会后,高君宇等人分赴各校广泛发动,为第二天游行示威进行积极筹备。

5月4日,高君宇和北大爱国学生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和警察的重重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与北京十几所学校的爱国学生3000余人汇合。学生们在天安门前召开了群众大会,高君宇等人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举着多种颜色的旗帜和标语,群情激昂地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东城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门前时,大家激愤起来。高君宇和一部分爱国学生用搭人梯的方法攀墙而入,冲进曹宅,从里面打开门,愤怒欲绝的学生一拥而入,痛打了正在曹家来不及躲藏的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曹宅。反动军

^① 郑洸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警闻讯赶来逮捕了 32 名学生。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同学而日夜奔走。“北京学联”决定次日全市学生总罢课。5 月 5 日下午二时许,各校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大会并决议:严惩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释放被捕学生。5 月 7 日,北大被捕同学被释放归来,高君宇和北大同学在二院操场举行了欢迎大会。



1919 年爆发五四运动。5 月 7 日,山西大学、省立一中等 11 所学校数千名学生集会,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会后 3000 余名学生游行示威,迫使山西当局致电北洋军阀政府转达学生的要求。图为当时省议会拍给北京政府的电报。

5 月 9 日,北京政府传

令嘉奖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并要传讯被释放的爱国学生,追究五四运动的“主使人”。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更大愤怒。高君宇受北大全体同学的委托,毅然担任了北大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广泛进行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学生酝酿着新的更大的斗争。紧接着,北京学联在北大二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宣传活动,同时决定派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全国规模的斗争。

如火如荼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自 5 月 5 日以后,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爱国浪潮席卷全国。消息传入娘子关后,在 5 月 7 日,太原学生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太原 11 所中等以上学校的 2000 余名学生在文瀛湖畔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王振翼、张友渔等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发起组织了山西省学联。他们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呼吁誓死收回青岛,惩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会后,王振翼、张友渔等参加了学生游行示威,学生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抗议北洋

政府的卖国外交,迫使山西当局致电北洋军阀转达学生要求。^①随后,太原大中学校学生相继罢课,各校学生代表们联合起来,组织讲演团,在大街小巷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呼吁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共诛国贼,洗雪国耻。王振翼等还积极组织 and 参加罢课、罢市、焚烧日货等活动。学生爱国运动的壮举,打破了古城太原万马齐喑的局面。

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1920年3月,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高君宇变得更加成熟了,他已经由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转变成了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同年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这天,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以北大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组织上街讲演,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就在这一天,高君宇还发表了两篇关于工人问题的文章。一篇是高君宇应陈独秀之约,请其在晋的好友韩雪峰和方成章调查了山西大同、太原各行业工人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后撰写的长篇报告。该文揭露说,在阎锡山统治下工人的工资“比苍蝇的翅膀都薄了”^②,童工更是食不果腹,过着牛马生活。另一篇题为《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高君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指出:“社会的种种组织都作根在经济组织上边。社会的争斗,压制、贫困……都是经济‘不平’使然。”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把一切生产机关从资本阶级收归,按照自由共有的大义,建设新的经济组织”。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得首先“破坏政权”^③。这表明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研究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高君宇跟随李大钊,多次参与了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与北大

① 共青团山西省委编:《不尽黄河滚滚来——山西青年运动史画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②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③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进步学生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李大钊等经过一段酝酿准备,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10月宣布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者有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等,李大钊任书记。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使高君宇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改造社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11月首先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号召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从事实际活动。高君宇和邓中夏等根据共产主义小组的指示,深入到工人中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参加了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讲演团的主要骨干。这年冬天,他们又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为工人子弟上课,晚上给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第一批骨干,为以后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逐步办成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外围组织,每逢星期天和假日,就到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在北大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成立大会的有40余人,会议通过了北京团的章程,推选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为书记;^①确定主要工作是学生会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中吸收同志;在组织分工上设立调查、宣传等四股制及委员制,每人分工负责,开展工作。

北京团组织建立后,即加强与青年共产国际的联系,并组织部分青年赴俄参观学习。1921年3月,高君宇等与来华的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取得了联系。北京青年团根据格林的要求,于3月16日,在北大二院召开特别会议,高君宇报告了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格林在京的活动情况,选举何孟雄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3月30日,在团的第四次会议上,高君宇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工作。4月24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二院举行团的第五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大钊和高君宇、张国焘、罗章龙等16人。这次会议由张国焘汇报了前三次执行委员会作的几项决议;安排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纪念活动等事宜;决定派人到唐山等地发展团组织;会议还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拘禁在黑龙江陆军监狱的赴俄代表何孟雄,李大钊一方面请北大校

^① 《李大钊传》编写小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长蔡元培出面保释,一方面提出筹募营救资金的建议。高君宇十分赞同,并当即带头捐款。

四、帮助筹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全国的青年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1921年4月下旬,高君宇受李大钊的派遣回到山西,致力于山西的建团工作。从北京回到太原后,高君宇在他的母校——省立一中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人生观问题,参加者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十几人。当高君宇了解到太原青年运动和青年思想的状况后,得知此时无政府主义流传甚广,于是,他首先从整顿青年思想入手,在太原省立一中一次青年会上,严厉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青年的信仰问题解决后,创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条件随之日趋成熟。

1921年5月1日,高君宇召集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梁震、姚享、高成哲等进步青年学生,在太原省立一中秘密集会,组织建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充分、热烈的讨论,他们确定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并选举王振翼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

为了使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高君宇和王振翼、贺昌等改组了五四后期为宣传新思想而创办的《平民》周刊为团刊。^①该刊以“为人民奋斗”为宗旨,“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将世界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晋民以奋斗有效的途径。”《平民》创刊号诞生之后,王振翼欣喜地把刊物寄给高君宇,高君宇又把这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针砭时弊、抨击现实的进步刊物,兴冲冲地分送给了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同学。此后,高君宇也经常寄一些《国民》、《新潮》等刊物给王振翼、贺昌,以开拓他们的办刊思想,而且还经常写信指导他们说:五四运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全国人民瞩目的山东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希望《平民》周刊能配合斗争的需要进行宣传。

^① 共青团山西省委编:《不尽黄河滚滚来——山西青年运动史画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平民》周刊的创办,不仅向社会披露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疾苦,还有力地抨击了阎锡山政府巧取豪夺的统治。它的传播,打破了省立一中固有的“论学科注意读经,论校规注重道德”的迂腐沉闷之气,受到山西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读者的喜爱,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山西的传播。薄一波曾在回忆中说:“《平民》对山西早期革命思想的传播有极大影响。”因此,它引起阎锡山的忌恨,当《平民》出至五十期左右,1922年5月被勒令停刊。高君宇得知此事后,把《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编印,然后由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太原,继续鼓励青年进行反对阎锡山的斗争,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

高君宇在太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就回到北京,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山西青年的革命斗争。1921年七八月间,他委托王昉等人利用暑假回家探亲之机,帮助太原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的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等大批革命书刊,成了山西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问世后,“晋华书社”又成为该刊的秘密发行处。当高君宇在北京得知“晋华书社”因经费困难无法维持时,便奔走于京、津等地为其筹措资金,使“晋华书社”得以坚持下去。由于“晋华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终为阎锡山所不容而被查封,但它已在山西人民之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向导》周报和《新青年》这两个刊物对山西建党、建团的影响是很大的,许多进步青年入团、入党就是受了《向导》周报的影响。

1921年10月初,在高君宇的帮助下,王振翼、贺昌等在省立一中成立了“以研究学术,服务社会”为宗旨的青年学会,^①并出版刊物《青年》杂志,以教育团结进步青年。后来,青年学会由傅懋功(彭真)、王瀛等继续负责主持工作,把吸收会员的范围扩大到校外,教育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为山西培育了一批青年革命干部。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开拓了道路,为壮大发展团组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山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李大钊倡议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该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

① 胡梁:《红色人生》,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总会设在北京，由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领导。该会出版的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由于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复杂，主张各异，目的不一因而斗争相当激烈。为了团结多数，鼓励少数，以便进一步传播革命真理。李大钊和高君宇、邓中夏等北京会员中的共产党人，曾多次同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1921年7月初，根据李大钊的意见，高君宇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鸡鸣寺召开的年会。在这次年会上，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针对一些人不赞成将少年中国学会搞成政治团体的主张，高君宇提出：“学会有采取某种主义之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他指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共同主义，这也是无疑的。如何能为学会产生一种共同的主义，今天应有一个大略的决定。我认为主义不是宗教，是一种方法，是用它对社会各方面实行改造的方法，不限于政治经济方面”。^①这次年会经过讨论，成立了社会、哲学、生物、地质等十几个研究会。高君宇参加了生物学、地质学研究会，并被推举为负责人。为了同国家主义分子作斗争，为了把少年中国学会引导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后来高君宇还参加过在杭州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在那次会议上，高君宇再次旗帜鲜明地倡导说：“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他明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美国亦在反对之列。”他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会员的赞同和支持。

五、在北京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经过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从此，在中国产生了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

北京党组织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

^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的机构。高君宇和研究会的同志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几经讨论之后，决定由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出面，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招收会员的启事。他们还自筹资金，购置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建立了一个附属于该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斋”即书舍之意。后来，研究会和共产国际建立了秘密联系，又订购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外文原著和介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高君宇等人认真研读了这些书籍，还定期举办了讨论会、讲演会，邀请非会员参加，以扩大影响。通过有组织的学习讨论活动，不仅促使一批青年的思想转变，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许多进步青年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提高了思想觉悟，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样，研究会就由秘密走向公开，会员与日俱增，不久就由最初的四五十人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六、出席“远东会议”的中共代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但由于党刚刚成立，缺乏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一切都需要不断探索总结，尤其需要有革命理论的指导。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高君宇、张国焘、张太雷、邓培、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这次会议。1922年1月21日，远东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列宁、斯大林等俄共领导人被推选为名誉主席，中国代表高君宇、张国焘、王尽美等8人被推举为大会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远东革命少年会议宣言》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高君宇、张国焘、邓培等8名中国执行委员在大会宣言上签了名。这次大会重点分析和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还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了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正确地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基本路线，指出了各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这些精神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大会闭幕后，高君宇和邓恩铭、王尽美等在留苏学习访问的期间，他们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面考察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状况

和革命经验,还参观了工厂、学校、部队和农村,并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的义务劳动。这一切使高君宇对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而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2年4月,高君宇等人为了避开白匪的袭击,便取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到北京。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君宇被选为团中央委员。7月他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高君宇和张国焘向全体代表传达了远东会议的精神和列宁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全体代表在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之后,根据远东会议的精神,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任务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大会选举了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蔡和森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决定出版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指定蔡和森和高君宇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向导》编委会下设翻译室,分设英、法、德、俄、日5个小组。

七、建党初期的理论家

高君宇在致力于编辑《向导》期间,自己也写了许多文章,分别发表在《向导》和《政治生活》等报刊上。他在这些文章中,反复阐述民主革命的思想,对唤起工人和人民群众参加民主革命斗争,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促进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表达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其二,要进行国民革命,必须由共产党这个先锋队来领导;其三,要反对强大的敌人,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其四,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取得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

《向导》自创刊之日起,就受到反动军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1922年10月,《向导》编辑部迁到北京后,更是充满危险困难。但是蔡和森和高君宇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以巧妙的方式,使《向导》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得以顺利进行。他们把印刷厂设在偏僻的小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作掩护,来对付暗中窥视的密探。为了让《向导》迅速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他们设法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工人发往上海、北京、广州、武昌、济南、南京和